

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群经济发展

——来自 285 个地市级城市的面板数据

王麒麟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200433)

内容摘要: 城市行政级别是政府干预的产物之一,本文以地市级城市面板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城市行政级别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全样本分析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的对比分析可知,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则城市群的经济越好。政府行政干预不仅直接影响经济,而且还通过间接作用于人口、投资、财政支出等内容来影响经济,且这种间接影响表现为城市群的差异化特点,如城市行政级别对投资的干预在长三角城市群最强,城市行政级别对政府支出的干预在京津冀城市群最为明显等。

关键词: 城市行政级别 城市群 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1309(2014)05-0075-008

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群的产生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之一,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城市化导致了区域发展的差异化,一些地方发展越来越好,而一些地方却陷入经济怪圈,处于恶性经济循环中。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群的经济逐渐引起了官方与学者的重视。城市群的发展不仅代表了区域发展的能力,而且还彰显了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分工的竞争力。从国际层面来看,发达国家的城市群经济占到国家经济总量的 70% 左右,而我国全部城市群经济的总和不过占到全国经济总量的一半。因此,如何促进城市群的经济,对于发展区域竞争力、提升国家整体经济水平有着较为现实的意义和政策意涵。

根据国外经验发展城市群的关键在于四个因素,即工业化推动、发展外向型经济、产业集聚,以及核心城市(王乃静,2005)。虽然我国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转型较快,但仍改变不了城市群在国家层面综合实力的弱势地位,如我国城市群的经济贡献度偏低、劳动生产率偏低,以及在产业融合度、城市融合度上较差(王小卫和陈克禄,2008)。从本质上讲,城市群的发展离不开决定经济的要素贡献,例如人口迁移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有促进作用(王桂新等,2005),外资进入对长三角城市群的影响(钱云航,2006),制度创新对城市群发展的推动作用(崔大树,2003)。不过,城市群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城市之间发展的差异化问题。因而应该根据不同阶段城市群内城市规模结构、城市之间分工协作程度等特征的不同,选择差异化发展战略(苏雪串和舒银燕,2012)。

以上情况从侧面折射出一个问题,即城市异质性,不同城市在要素禀赋、开放度等都有不同,故城市群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城市异质性的影响。考虑到我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国家,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必然存在政府干预行为。政府干预从多个角度来影响经济,其中

收稿日期: 2014-04-18

一个重要的干预行为就是对城市进行级别划分,政府的这种行为本质上具有先验性的特点,它的存在不仅导致了资源配置的反市场化,而且加剧了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平等。此外,还可能助长市场分割,这些内容都对经济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像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一样,每个人都被贴上了一个标签,可以想象,作为经济繁荣载体的城市本身若贴上了“级别”这一标签,则必将对市场经济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因而,本文试图从城市异质性的角度出发,探讨城市行政级别对城市群的经济影响,目的在于揭示:(1)在城市群的区域内,经济发展是否因城市行政级别而有所不同?(2)在不同的城市群,城市行政级别对经济的影响是否有差异?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分析285个面板数据,给出全样本下的实证结果,然后分不同城市群进行子样本分析,最后将全样本与子样本作对比分析,以得出较为稳健的结论。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本文主要探讨城市行政级别对城市群的经济影响,本研究首先给出一个简单的回归式:被解释变量为城市经济总量($\ln gdp$),用城市实际GDP的对数来表示,解释变量主要考虑要素禀赋,故这里分别纳入了投资规模(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 $\ln invest$),人口规模(城市户籍人口的对数, $\ln pop$),政府规模(城市财政支出的对数, $\ln gov$),外资冲击(城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对数, $\ln fdi$)。根据对以上变量进行回归可以初步判断各个要素对产出的生产弹性。在此基础上,再纳入城市行政级别哑变量($city$),以考察城市行政级别对城市群的经济影响,计量公式设定如下:

$$\ln gdp_{it} = \beta_0 + \beta_1 \ln invest_{it} + \beta_2 \ln pop_{it} + \beta_3 \ln gov_{it} + \beta_4 \ln fdi_{it} + \beta_5 city_{it} + \varepsilon_{it}$$

其中 ε 表示随机项, i 和 t 分别表示第 i 个城市和第 t 个年份。为了进一步探讨城市行政级别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在上式基础上引入城市行政级别与投资规模、人口规模、政府规模,以及外资冲击的交叉项,意在确定城市行政级别在要素驱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关于中国城市行政级别的确定,本文按照级别大小,在287个地市级城市里,首先对正部级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个直辖市,哑变量取值为3;其次对副部级城市,包括沈阳、长春、哈尔滨、南京、武汉、广州、济南、杭州、西安、成都这十个省会城市,和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大连这五个计划单列市,哑变量取值为2;再次对正厅级城市,包括除上面所列的省会城市以外的其他省会城市,哑变量取值为1;最后对副厅级及以下城市,主要包括除以上所列的几个级别以外的其他城市,哑变量取值为0。需要说明的是,行政级别划分的依据还有多个版本,由于本文主要是基于城市级别的重要性以及政府经济权限的考虑,所以没有兼顾城市规模。例如在个别版本中,对正厅级城市的划分行列里纳入了国务院批准的唐山市、大同市、包头市、鞍山市、抚顺市、吉林市、齐齐哈尔市、无锡市、淮南市、洛阳市等十个“较大的市”,而本文的划分只保留了省会城市;又如较热门的一线城市是针对北上广深这四个城市而言,按照经济总量广州远远超过重庆,但本文主要依据行政级别,所以副部级城市的确定没有参考一线城市的划分方法。

研究的方法(1)在计量分析中:本文同时考虑简单最小二乘法(OLS)和面板混合效应法(Mixed),由于面板的固定效应(FE)在分析城市行政级别的影响时会忽略掉该指标(面板固定效应假定解释变量中随时间不变的因素都会忽略),故本文对该指标乘以年份哑变量,形成城市行政级别与年份哑变量的交互项(如 $yr2012 * city$)。这样再利用固定效应就可以进行分析了。(2)在样本选择中:首先利用287个地市级面板数据进行基准回归,试图在一个较全面的地理范围内得出城市行政级别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然后将全国地市级数据按照城市行政级别分为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以及成渝城市群四个区域,探讨在这些城市群的区域内是否存在城市行政级别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例如,长三角城市群中既有正部级城市(上海),又有副部级城市(南京、杭州),还有正厅级城市等,这些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是否在经济的发展中受到行政级别的制约,

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在数据来源上,本文使用的面板数据均来自 CEIC 数据库,样本长度为 2003—2012 年,截面个数为 287 个地市级城市。由于拉萨的数据缺失较多,故剔除。由于横截面包含了十分全面的地级市城市,在分析时具有宽样本的特点。

三、基准回归结果

城市经济总量往往受到要素禀赋的影响,从表 1 的(1)式可以看出:投资规模、人口规模、政府规模和 FDI 的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都为正,说明这些要素对城市经济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当纳入城市行政级别这一指标后,(2)式显示,城市行政级别的系数在 0.001 的水平上是显著的,故城市行政级别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为了稳健性起见,我们又给出了混合效应与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见表 1 的(3)式和(4)式。结果显示:城市行政级别的系数是显著的,并且在(4)式中,随着年份的不断推移,城市行政级别对经济的影响是逐渐增强的。多种回归结果表明,城市经济总量的确受到了城市行政级别的影响。

表 1 城市行政级别与经济发展

	(1) OLS	(2) OLS	(3) Mixed	(4) FE
lninvest	0.425 *** (28.68)	0.434 *** (29.25)	0.434 *** (29.25)	0.158 *** (14.89)
lnpop	0.249 *** (25.42)	0.243 *** (24.81)	0.243 *** (24.81)	0.168 *** (4.57)
lngov	0.248 *** (16.04)	0.230 *** (14.58)	0.230 *** (14.58)	0.469 *** (38.86)
lnfdi	0.105 *** (25.78)	0.101 *** (24.37)	0.101 *** (24.37)	0.059 * (2.05)
city1		0.058 *** (5.43)	0.058 *** (5.43)	
年份* city				YES
N	2743	2743	2743	2743
Adj. R ²	0.925	0.926		0.876
Wald chi2(5)			34146.29	

注:括号内的数值表示 t 值,*、**、*** 分别表示在 0.05、0.01、0.001 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其中,yr2004* city、yr2006* city、yr2008* city、yr2010* city 和 yr2012* city 的系数分别为 0.038、0.055、0.086、0.083、0.128,且均十分显著,为了节省篇幅,表中没有显示这些交互项,只用“年份* city”表示,下同。

对城市作行政级别划分,既有历史的成分,又有体制转型的因素。不管怎样,这一政府行为都离不开政府的行政干预。实证研究表明,政府干预在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都有体现,如地方政府干预影响地方国企投资(唐雪松等,2010)、政府干预影响企业并购(方军雄,2008;潘红波等,2008)等。对比表 1 的(1)式和(4)式可知,纳入城市行政级别这一变量后,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被挤出一部分,取而代之的城市行政级别的正系数,说明城市行政级别可能对社会投资有一定影响。另外,城市行政级别在一定程度上暗含了领导之间的政治联系,级别越高,则中央对该城市的重视度就越高,会在财政等政策方面优先考虑它们,故城市行政级别越高,越有助于该城市得到更多的财政支持。以上两个方面构成了城市行政级别对经济发展的两种投资干预。结果表明,不同行政级别的的城市在投资上存在明显的差距,进而影响其经济发展程度,导致了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部分城市之所以极强烈地依赖于政府干预,一方面是与政治晋升有关,另一方面在于其已经陷入了干预陷阱(张璟和刘晓辉,2006)。

接下来探讨城市行政级别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本文在原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投资规模、政府规模、人口规模、FDI与城市行政级别的交互项,形成表2。之所以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在经济总量上存在较大差距,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在投资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社会投资与政府投资上。面板数据显示,正部级、副部级、正厅级和副厅级及以下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对数的均值分别为12.80、12.01、11.11和10.22。随着城市行政级别的降低,城市投资规模也逐渐变小;正部级、副部级、正厅级和副厅级及以下城市的政府财政支出对数的均值分别为11.78、10.44、9.40和8.82。易见,政府规模也随着行政级别的降低而逐渐变小。在两种投资规模都存在巨大差距的前提下,行政级别越高,投资差异对城市经济总量的影响也越大。从表2的(1)式和(3)式可看出,投资规模与城市行政级别的交互项为0.026,且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政府规模与城市行政级别的交互项为0.03,也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这两个数据显示,城市行政级别加速了两种投资对经济的影响。

第二,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越容易引起人口集聚。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各个城市在发展战略上争相竞争,而这在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尤为明显。例如正部级城市愿意创造更文明的文化环境、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基础设施等。于是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会迅猛增加,而人口对经济的作用本身就很明显,主要体现为人口的规模效应,这种效应又会在行政级别更高的城市作用更强。从表2的(2)式就可看出,人口规模与城市行政级别的交互项为0.169,且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人口对城市经济的规模效应随着城市行政级别的上升而加强。

第三,城市行政级别越高,越不利于FDI发挥作用。表2的(4)式显示,城市行政级别与FDI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这说明,城市行政级别较低的城市,其FDI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反而越强。原因可能在于FDI受到了政府干预的影响,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则这种干预越强烈。

表2 城市行政级别对经济发展的机制分析

	(1)	(2)	(3)	(4)
	FE	FE	FE	FE
lninvest	0.121 *** (9.74)	0.152 *** (14.09)	0.151 *** (14.02)	0.151 *** (14.14)
lnpop	0.260 *** (6.97)	0.0413 (0.60)	0.246 *** (6.50)	0.288 *** (8.15)
lngov	0.532 *** (46.58)	0.529 *** (46.29)	0.498 *** (37.13)	0.520 *** (45.79)
lnfdi	0.00672 * (2.24)	0.00625 * (2.08)	0.00654 * (2.19)	0.0194 *** (5.91)
invest* city	0.0261 *** (4.36)			
pop* city		0.169 *** (4.53)		
gov* city			0.0302 *** (5.02)	
fdi* city				-0.746 *** (-8.81)
N	2743	2743	2743	2743
Adj. R ²	0.864	0.663	0.863	0.877

注:括号内的数值表示t值,*、**、***分别表示在0.05、0.01、0.00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

综合来看,城市行政级别之所以越高,越会对经济发展起作用,是因为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在

投资、人口、FDI 上具有不同的特点,行政级别越高,则在社会投资与财政投资上能占据更多的份额,能在人口集聚上获得更多的优势,便于提高经济总量。而行政级别越高,则该城市的政府干预也越强烈,这样不利于 FDI 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四、城市群的回归结果

下面我们进入到城市群的核心分析。利用前面的模型,首先考虑京津冀城市群,它地处京津冀都市经济圈,主要包括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承德、张家口、保定、廊坊、秦皇岛、沧州、邯郸、邢台、衡水,位于东北亚环渤海心脏地带,是中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地区。在该样本中,正部级城市有两个(北京和天津),没有副部级城市,正厅级城市有 1 个(河北的石家庄),副厅级及以下城市 10 个。根据表 3 的估计结果,(1) 式显示,在京津冀城市群,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则城市经济总量越大。在加入投资规模、政府规模、人口规模、FDI 与城市行政级别的交互项后,(2) - (5) 式显示,交互项都十分显著。这表明,在京津冀城市群,投资规模、政府规模、人口规模与 FDI 对经济的作用受到城市行政级别的影响,且城市行政级别越高,这种影响越强。

其次,分析长三角城市群。2009 年,有 16 座城市被列入长三角都市圈,主要包括上海,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共 8 市,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和台州 7 市。在该样本中,正部级城市有 1 个(上海),副部级城市有两个(南京和杭州),没有正厅级城市,副厅级及以下城市有 13 个。根据表 4 的估计结果,(1) 式显示,在长三角城市群,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则城市经济总量越大,这与京津冀城市群相似。在加入投资规模、政府规模、人口规模、FDI 与城市行政级别的交互项后,(2) - (5) 式的交互项系数均十分显著。这表明,在长三角城市群,投资规模、政府规模、人口规模与 FDI 对经济的作用均受到城市行政级别的影响,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则这种影响越强。

再次,分析珠三角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地区包括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珠海、惠州、江门、肇庆共 9 个城市。“大珠三角”指广东、香港、澳门三地构成的区域,面积约 18 万平方公里。由于香港、澳门与内地经济政治制度差异较大,故剔除,只考虑广东省内的 9 个市。在该样本中,没有正部级城市,副部级城市有两个(广州和深圳),没有正厅级城市,副厅级及以下城市有 7 个。从表 5 的估计结果可知,(1) 式的城市行政级别与年份哑变量的交互项均不显著。这表明,在珠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总量并不受到城市行政级别的影响,这与前面的两个城市群结论差异较大,可能体现出珠三角城市群的市场化比较完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于政府影响。而且从(1) 式中政府规模的系数不显著也可看出:当加入投资规模、政府规模、人口规模、FDI 与城市行政级别的交互项后,(2) - (5) 式显示,四个交互项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进一步说明,投资规模、人口规模对经济的作用不会受到城市行政级别的影响。

最后来看成渝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主要包括重庆市,和四川省的成都、绵阳、德阳、眉山、乐山、资阳、内江、自贡、宜宾、泸州、遂宁、南充、广安、达州 14 个地级市。在该样本中,正部级城市 1 个(重庆),副部级城市 1 个(成都),没有正厅级城市,副厅级以下城市 13 个。表 6 的(1) 式显示,城市行政级别在靠后的年份容易对经济产生影响,而在较前的年份不会产生影响。(2) - (5) 式的四个交叉项均十分显著,这表明,在成渝城市群,投资规模、人口规模、政府规模与 FDI 对经济的作用均受到城市行政级别的影响,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则这种影响越强。

综合来看,城市行政级别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城市行政级别的存在使得城市在各项投资规模上占据一定的优势,并且容易借助人口积聚来达到人口的规模效应,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对比表 3 - 表 6 的(1) 式可知,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的发展容易受到城市行政级别的影响,且随着年份的增加(2004 - 2012),这种影响不断增强。可以预见的是,中央最重视的两个城

市,一个是北京,地处政治中心,另一个是上海,地处长三角沿海中心,两者在地理上虽然相差较远,但正部级城市的地位仍然使得它们在各项发展要素的获取上存在很大的便利性,故以它们为首的城市群发展极容易受到城市行政级别的影响。然而,珠三角城市群就未受到城市行政级别的影响,多个年份的哑变量检验表明,只有2010年比较显著,且显著性水平较低。考虑到广东离香港、台湾很近,开放度的提高使得地区经济发展不受地方行政干预的影响,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地方政府在百姓眼中的地位小于企业的地位。成渝城市群在2008年前没有受到城市行政级别的影响,而在2008年以后受到了这种影响,可能的原因是2008年以后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力度有所加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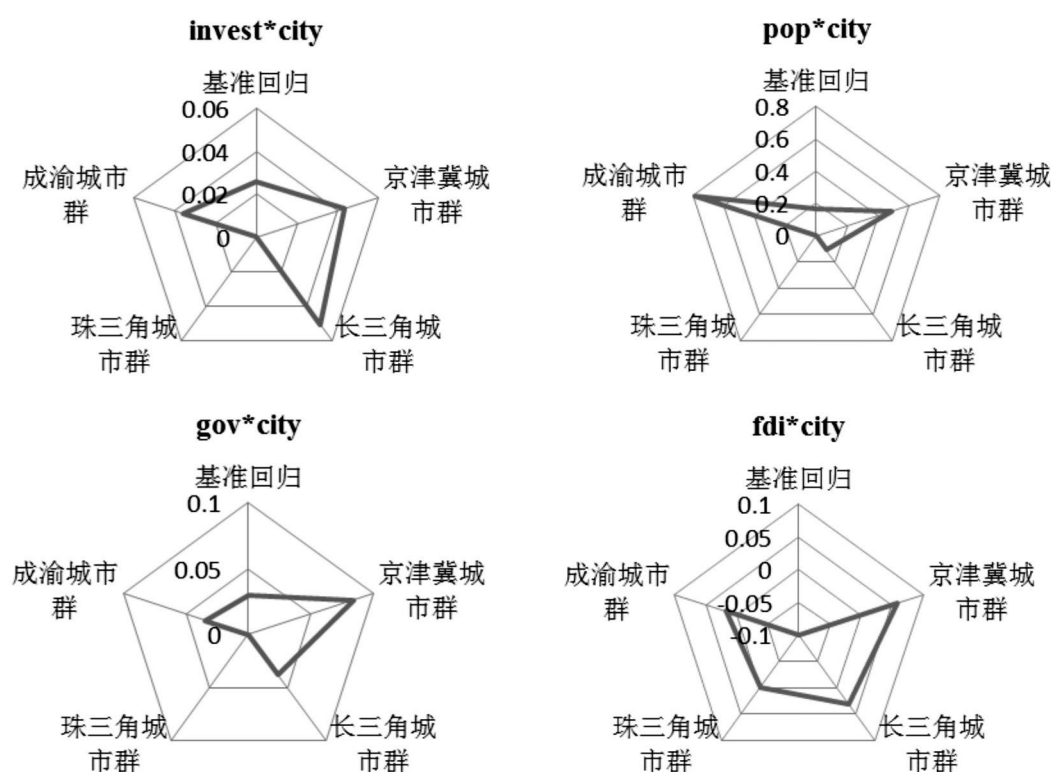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机制对比

从发展机制上看,城市行政级别的上升不仅推动了投资的产出效应,而且加速了人口的规模效应与政府支出的产出效应。但是,在外资拉动经济的效果上不占优势,行政级别越低的城市反而越容易获得外资的益处,可能是由于政府干预行为造成的。通过将表3至表6的整合,本文分别给出四个城市群的固定资产投资与城市行政级别交互项($invest*city$)、人口规模与城市行政级别交互项($pop*city$)、政府支出与城市行政级别交互项($gov*city$),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与城市行政级别交互项($fdi*city$)对比蛛网图。为了增强对比度,本文也加入了基准回归作为一般性结果,具体如图1所示。从该图可知:(1)投资产出效应最容易受城市行政级别影响的城市群是长三角,其次是京津冀,珠三角最次。固定资产投资代表了一个城市资产集聚和实现价值的能力,而这个转化过程需要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长三角作为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其资产价值的转化能力最强,而且地处沿海,便于吸收外界先进的技术经验,利于产品投资与研发,利于产业的升级与更新。而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越能够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与金融环境等条件,这些条件更利于企业的自身成长,利于产业群的集聚,以及促进投资的外溢效应,因而,长三角城市群在这方面做得最好。

(2) 人口规模效应最容易受城市行政级别影响的城市群是成渝,其次是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处于很低的位置。单从人口规模来看,以北上广为首的一线城市容易聚集更多的居民,成都和重庆居于较弱的地理位置。但人口多不一定代表生产力,一线城市虽然人口众多,但带来劳动力和刺激消费的同时也引来了更大的城市承载力问题,如社会保障、医疗问题、交通问题等。因而适度的人口规模才可能对经济发展有益,表3-6中 $\text{pop}^* \text{city}$ 的系数就说明这一点。成渝城市群的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最大的,就此而言,成渝城市群的人口规模可能是一个较符合经济规律的适度规模。(3) 政府支出产出效应最容易受城市行政级别影响的城市群是京津冀,长三角紧随其后,珠三角最次。政府支出行为受到城市行政级别的影响再正常不过了,而这种影响又在京津冀城市群表现的最为明显就更加正常了。因为京津冀位于政治圈,北京又处于政治圈的中心。所以,财政偏向必然受到城市行政级别的影响。不过从表3发现,政府支出与城市行政级别交互项系数为0.04,而城市行政级别与年份哑变量的交互项在2008年、2010年和2012年分别是0.099、0.099和0.015。显然,政府行政干预对经济的直接影响远比通过支配财政间接影响更加有效。另外由FDI的系数不显著也反映了近几年外资的作用没有显现,这些都暗含了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始终受到了政治的强烈干预,市场化步伐仍然较慢。(4) 城市行政级别对FDI产出效应在各个城市群相差不是很大。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依次递减。不过基准回归的结果显示为负,而这里分不同城市群的结果却显示为正,表明城市行政级别对FDI的产出效应受到了城市异质性的影响。

四、分析结论

本文利用地市级面板数据解释了由城市异质性带来的经济发展机制在不同城市群的差别,这种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府行政力量的干预,一个较为重要的代表性现象就是城市行政级别。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则越容易在社会投资、政府投资上得到便利,以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进一步,从不同城市群的分析结果也可看出城市群的发展差异。首先,城市行政级别对投资的干预在长三角城市群最为强烈,这体现了市场一体化的分布差异特点;其次,以一线城市为首的城市群并未在人口规模效应上占有优势,成渝城市群反而做得较好,并利用了城市行政级别的有利作用,对城市自身发展有一定的提升;再次,以城市行政级别为表现的政府干预在京津冀城市群最为明显,城市行政级别越高,越能揽到财政资金以促进自身城市发展;最后,FDI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四个城市群相差不是很大,都表现为正向,说明四个城市群在处理政府干预与招商引资之间的关系上做得较好,并得到了FDI的产出效益。

城市行政级别对经济的不良影响主要体现在妨碍市场一体化,造成区域不平等,以及导致市场分割等三个方面。然而行政级别也无法退出,这就造成政府干预的双重作用:一是对财政偏向城市的直接干预,二是通过间接影响要素流动进而干预经济。而城市群的发展很容易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并且仍然离不开产业集聚这一重要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王乃静(2005)的观点。虽然本文的结果显示,行政级别对城市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是来自于政府干预下的促进,而不是由市场本身所带来的促进。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城市群的发展仍脱离不了政府干预这只手。

另外,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城市行政级别是否该内生于市场中?城市行政级别本来是先验性的,具有外生的特点,然而由这种因素所导致的城市群发展差异化、收入差距拉大等现象会影响要素在地理上的再分配,这就会引致城市群发展的进一步差异化。以此类推,最终的结果是一些城市群不断扩张。而另一些城市群慢慢收缩,最后消失。从市场的角度看,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然而城市行政级别的存在会使得地处不利位置的城市群难以退出经济圈,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

行。所以,城市行政级别的确定是否该内生于市场,更多地考虑市场因素可能更有利于行政干预边界的界定。□

参考文献:

1. 王乃静. 国内外城市群发展模式与经验借鉴: 兼论山东半岛城市群双阶段发展战略 [J]. 经济学动态, 2005 (12).
2. 王小卫, 陈克禄. 发展中国城市群的经济分析与战略选择 [J]. 上海经济研究, 2008 (4).
3. 王桂新, 魏星, 刘建波, 张伊娜. 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与城市群发展特征研究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5 (2).
4. 钱云航. 长江三角洲外资空间演进对城市群发展的推动机制 [J]. 世界经济研究, 2006 (10).
5. 崔大树.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城市群发展的制度创新 [J]. 财经问题研究, 2003 (5).
6. 苏雪串, 舒银燕. 我国城市群发展的差异化战略分析 [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2 (8).
7. 唐雪松, 周晓苏, 马如静. 政府干预、GDP 增长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 [J]. 金融研究, 2010 (8).
8. 方军雄. 政府干预、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并购 [J]. 管理世界, 2008 (9).
9. 潘红波, 夏新平, 余明桂. 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 [J]. 经济研究, 2008 (4).
10. 张璟, 刘晓辉. 政府干预、关系型贷款与干预陷阱 [J]. 世界经济, 2006 (9).

City Administrative Leve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etropolitans

WANG Qi-lin

(School of Economics , Fudan University 200433)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prefecture level city ,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city' s administrative level on city group' 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nclusions are that , (1) the higher administrative level of the city , the better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ity group. (2)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not only impacts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by direct effects , but also by indirect effects on population , investment , government spending , etc. (3) The indirect effects assume city groups' differentiations.

Keywords: administrative level; city group; economic development